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许永宁,颜光洁[1]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

[关键词] 顾城; 个体体验; 自我观念; 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4-0103-08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58

20 世纪 80 年代,在新启蒙话语的召唤之下,对于“朦胧诗”以降的诗人与诗歌的理解逐渐进入“现代性”谱系之中,这样的方便之处在于,将诗人置于一个时代的潮流之中,便于准确定位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价值与意义。但与此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则是,在一个混装无差别的装置中,个体被压抑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启蒙话语或“现代性”观念更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展开。因此,从追寻“自我”出发,对诗人“个体”体验的考察,在还原其独异而又张扬的个体文学观念的同时,还有助于丰富与延展“现代性”观念的内涵。而顾城,正是处于时代洪流中独异而又合流的样本之一。

顾城诗歌的生成与其个人体验密不可分,无论是他孩童时期随父亲下放火道村,还是青年时期参与《今天》诗歌活动;也无论是他对北京城以及整个故园的依恋,还是进入新西兰之异域的生存实感,都对其诗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正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酝酿了他不可复制的文学才力。作为一个天才性诗人,他的作品不事雕琢,任由思绪徜徉,从自己的生命中流淌出一首首真的诗。终其一生,顾城无论是个体的经历还是诗歌的养成,都是对“自我”这一观念执着探寻的一种结果。也正是他对“自我”观念的找寻,丰富并内涵地拓展了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一 法“自然”而享“自我”的原初本能

身处繁华的都市生活之中,无处不被裹挟着时代与社会的洪流,那种“漂泊”的生存实感与“孤独”的内心警醒,时时吞噬着处于现代生活中的个体。因而对于纯粹精神理想的追寻往往显得弥足珍贵,不仅因为这一精神理想是对麻木与疲倦后病态躯体的一种精神性疗治,还因为无处安放的灵魂亟需一个等待栖息的诗意居所。所以无论是西方作家梭罗对于“瓦尔登湖”那种理想精神生活的营造,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等诗人哲学家对于“诗意栖居”精神原乡的召唤,还是顾城在激流岛所构筑“女儿国”的亲身实践,抑或是其诗所言,“在灵魂安静之后,血液还要流过许多年代”的现实困境,都让这种孜孜不倦的追寻,成为了一种现代性探求的原动力,而自我正是顾城努力探索的结果之一。

不同于从理论层面,高屋建瓴地去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哲学家,顾城从一开始对于“自我”意识的追寻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经验的独异。在整个人类社会都表现出对于大工业、大机器生产的现代文明的

[收稿日期] 2022-06-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朦胧诗:从争论到经典”资助(编号:18K024)
[作者简介] 许永宁(1987—),男,陕西旬邑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1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向往之时,顾城对于现代文明呈现出一种内省或反思的视角,如其《烟囱》一诗中所刻画的“烟囱”意象,“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1]。虽然我们不能将之简单的呈现为“自然”与“都市”两种文明的冲突对比,但是,借此可以探寻的是,顾城对于“自然”的认识,也远非简单的对于“大自然”的喜爱这一朦胧而又模糊的情感表达所能概括,其中既有对于原生态状况下造物主所缔造的自然这一风景的独爱,也有着“自然”状态下个体对于生命自由的“自我”追寻。正如老子哲学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也就具有了双重意味,那就是庄子“齐物论”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同一的平等观念,以及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的“效法”、探求自然规律来实现“自我”“自然而然”的理想形态。

同样的,顾城对于“自然”的体察,也兼具了这双重意味。一方面,顾城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来寻找属于自然的“自我”。首先呈现为对自然的摹写,在自然中寻找快乐,获取灵感,构成其“自我”意识萌发的最初来源。如其 8 岁时所写的诗句:“松枝上/露滴晶亮闪亮/好像绿漆的宝塔/挂满银铃铛”(顾城《松塔》),那种对自然观察细腻,充满童趣的诗歌在顾城的笔下摇曳多姿,以至于在其六七岁时就通过姐姐写了一首诗在明信片上寄给父亲,并且在受到父亲鼓励后喊出了“我将来是诗人!”的愿望。接触大自然,顾城获得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情态,这既是大自然给予顾城童年生活的一个礼物,也是奠定顾城诗歌创作的起点。其次,对于自然的摹写并不等于简单的观察记录,而是带有了歌者的一己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自然与人类所具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使得孩童时期的顾城能够细心地去感受自然所赋予万物的各自情态,进而有了对人类社会初步的探查。顾城对于自然的观察无疑都赋予了自己的情思,“我觉得在一个人的话,就显现为一种自然的心境,即与自然合一的状态。”[3]110 天上人间的一切,因为有了自然的比附,显得自然而多情起来,并显露出哲思的趋向。最后,因为对大自然的执着与向往,使得顾城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然”的底色,构成了其诗歌不同于其他朦胧诗诗人的自我诗学。从孩童时期对自然的观察和书写到青年时期借助“朦胧”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中间,自然作为“底色”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一代人》中的“黑夜”,《远和近》中的“云”,《门前》的“草”“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天空”“羽毛”“苹果”等等自然意象,空灵、清新,不染一丝尘埃,正如舒婷在《童话诗人》中对顾城的理解,“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4]。这些没有被“眼睛省略过”、没有被污染的自然意象,与现代社会形成明显的反差,平添了对尘世生活逃离的冲动。“‘我’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观念产物,是人为造出来与自然相对的。没有了这个相对,就没有了‘自我’的‘丧失’和‘寻求’。”[3]110 在相对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以自然为底色,以哲思为内核的“自我”诗学。

另一方面,顾城对于“自然”的理解,是将“触景生情”的自然之景与个体的经验相融合,使得童年时期的顾城,在享受大自然给予自由烂漫的自然风景的同时,也产生迥异于童年所应有的深沉思考。顾城在幼年所接触到 J·H·法布尔的《昆虫记》之后,被灰琐生活困扰的他仿佛打开了一扇科学与生命之窗,他开始关注周围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感慨它们发出的生命吟唱,哀叹寒夜里一只蟋蟀的消亡。幼年时的顾城很少与周围人沟通与交流,孤独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这么多年我可以感觉到:我就像一滴水从云里落下来,我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从离开云的一刹那,完全忘记了我的来源和我要到哪里去。”[5]234 当然,这种孤独并非天生的敏感,而是有其根源。

首先,顾城诗歌的孤独感来自现代诗歌所普遍具有的思想品格,这种孤独感恰恰构成了顾城诗歌“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而这一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作为诗人父亲顾工的言传身教。因此无论顾城是否能理解父亲被下放这一历史现象,生存环境的变化在顾城身上还是刻下了明显的烙印,在同辈群体中找不到归属感的顾城,只能转向无私接纳自己的自然——别有天地非人间,在那里畅所欲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最早的诗是自然教给我的”,在观察自然中发出“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的感慨。

其次,孤独不仅来自顾城个体随父下放的个体经验与生存实感以及由此而享受自然万物所给予的自由烂漫、无拘无束的馈赠,也有自老子以来“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对于人类生命自由状态的反向追寻以及庄子“道法自然”观念影响下对自然中“自由”的渴求。正如他在演讲中所提及,“我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了。长久以来,我不知不觉中把我

的思想、把我自己全都忘记了，忽然醒了，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新鲜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才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美。”[3]108 这种独自探寻世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状态和生命体验给了顾城极大的生命愉悦，为其找寻精神自由、实现自我意识觉醒提供了新的视野，让其能在童年时代找到一种自我归属感。

最后，转向自然的顾城，因为有了别样的境遇，“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内涵。他将这种人与人的疏离，平添了的孤独，在相对平和的自然中，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那样，“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的。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6] 所以顾城转向自然的书写，不仅是其对“外部世界”无视的产物，也是其内心精神“自我发现”的生成之由。在“风景”中，个体的内省与反思，借由孤独这一人类在现代文明普遍存在的病态形式显露出来。而“所谓的孤独和边缘，除了个体的存在状态，例如诗人的生活空间或者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它其实更加真实地、无孔不入地落实到了诗人面对生活的局促不安和脆弱无助的具体情境之中。”[7] 他无法理解周围人在说什么，别人也无法同感他的语言系统，两相作用之下，顾城习惯了与自然为友，在春风花草中感受真实的自我，感受不被认同的自我，在自然中发现生命的契机。

二　“文化—反文化”的自我流变

围绕体验展开，其实就是个人在不同时代，对自我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时代的突变使然，一个是个人人生经历的发展促使其不断反思。两者叠加交织，使得顾城的自我呈现出一种既有时代感又有个人化的感觉。而从自然回归城市的顾城，必然会在新的时代与社会中生发出新的体验，不论是时代社会的跌宕还是对社会活动的参与，都让顾城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这样的转变更能彰显其内部对自我装置的更新。结束下放返回城市的顾城，因为时代的转换，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了人生新的旅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动荡时期的北京，顾城开始了从油漆工、翻糖工、商店营业员到报社记者、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的工作，并先后有零星的文字见诸报刊。此一时期，两个重要的经历影响了顾城，使其开始从“自然之我”转向了“文化的我”，那就是与谢烨的爱情以及参与《今天》杂志的诗歌活动。文化到反文化，像一个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分子，他们缠绕着发生发展，共生共存，在文化中孕育着反文化的东西，在不同时代和年龄的影响下，隐现着不同的主流特征，呈现出文化到反文化的自我流变。

（一）文化的“我”的形成。

爱情是生命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生命体验，不同的爱情会带给人不同的心境和人生路径，顾城则是在与谢烨的爱情中找到了被隐藏和被遮蔽的文化自我。在谢烨身上，顾城找到了自己所不曾预料到的另一性格面——“隐藏的女儿性”，由于对孤独的参悟和体味，以及和外界无效的交流，顾城在人群中向来保持缄默，“我没办法弄清他们在说什么”，“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我有一阵儿就不说话，光听。”[8] 但在火车上初见谢烨时，顾城却主动伸出了橄榄枝，在谢烨的身上，他看到了久已消失的光，那种纯洁无暇的品质。顾城欣赏宁静的佛性和清静的女儿性，欣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认为其“质本洁来还洁去”[9]59-62。因此他想要如贾宝玉般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女儿国”，而在遇到谢烨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与谢烨相处的过程中，顾城内心纯洁的女儿性被唤醒，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另一个真实的顾城：“她是真实的我，长大，生活，使周围灰暗的世界变得洁净；她是真实的我，正向我走来，我们将在时间的某一点相遇，我灰色的翅膀为此变成眼泪。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10] 顾城曾不止一次与朋友谈到谢烨对他的影响，在其生命终结前的最后 14 天里，他还多次与姐姐顾乡谈到谢烨对他的意义：“她是天空，是土地，是我的呼吸……我可以没有，我的呼吸应该还在，那是我的天空和土地，它不应该给毁掉……我真是愿意谢烨照耀我……喜欢让人都能看见她的光芒。”[11] 在与谢烨相处的那段日子，顾城的诗风与以往大有不同，钟文就曾谈到：“回顾顾城的诗歌，我认为他写得又多又好的就是 1982 年到 1985 年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间正是他和谢烨恋爱到结婚的过程。”[12] 总的来说，在与谢烨和英儿相处的那段日子里，顾城是开心的更是自由的，精神处于一种极大的愉悦之中，可以说，在古典文学文本中的顾城找到了实现自我的一条路径，那就是“文化的我”的养成。

如果说爱情激发了顾城作为诗人最伟大的才情，形成了独异的个体文化的我，那么参与《今天》

的诗歌活动,更是将其文化功能从个体的独异走向与群体的合流,在这个过程中,顾城的标新立异,既有其作为诗人个性独特的一面,也有为《今天》诗歌整体上被时代和社会所接受呈现的合力性。从1979 年开始,顾城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积极参与诗歌活动,这与在火道村下放时期牧猪的顾城有着千差万别。顾城不仅参与了在赵金南家举办的《今天》文学沙龙,还先后参与了与《今天》有关的“星星美展”。即使在《今天》被解散以后,顾城都没有停止与《今天》诗人的交往,以至于在《今天》停刊后的十二年,顾城仍表达着对《今天》时代的怀念:“至今我仍感真切,在那个小屋里坐着,看几行字,我感到的是精神,那么破的屋子,那么坏的纸,那么可爱的人。”[13]与这种实际交往活动相关联,顾城此一时期的创作也迎来井喷,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天》存在的 1979——1980 的两年时间里,顾城创作了至少 417 首诗[14],这是在其他时间段内都无法比肩的存在。与这种诗歌创作实际相同步,顾城的诗歌创作风格也明显地发生了转换。从早期对于大自然的摹写,追寻自然“自我”的孤独感到这一时期社会参与与时代互动等“文化”自我与“社会”自我的转向逐渐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从其《世界和我》组诗中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定位,到对“安徒生”“阿富汗”等一系列世界话题的关注,从《赠师友》组诗中与诗人朋友的唱和到《一代人》中对于这一群体的素描以及对社会历史的反思,都可见其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迹象。这种转向既是历史变动带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所呈现的结果,也是个体在不同阶段的经历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变化所致。在这个过程中顾城通过反思历史来寻找自我的历史根基,通过批判社会来达到自我的现实根基,通过爱情来体现自我的个体根基,这一切的根基都指向自我与社会、历史以及个体深度的融合与参与,进而与历史的转向、社会的变动以及个体的成长形成合流,在突显自我的理论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发展的脉络与流向。

但是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事物的发生并非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是有着复杂的合力左右,只不过在一个主流作为显性特质存在的同时,非主流的思想作为隐形特质隐藏了起来,而随着事情发展往往会发生逆转。因此,在顾城受到爱情的刺激焕发个体独异的文化自我以及参与《今天》派活动而形成群体性的文化自我的同时,一种潜在的“反文化”的自我也在暗潮汹涌。

这种反文化态度的隐现潜伏已久,在度过了自然而然的儿童时代,成人期后的顾城在工作、爱情等生活经历都让顾城逐渐感觉到社会文化对其的挤压,他一边努力地适应文化带给自我的荣光,放逐文化充盈个体的精神生活,一边逐渐想挣脱文化对其的统治和束缚,逃离这被世俗和社会熏染的酱缸,于是生发了反文化的自我。此时的顾城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自喻“我”,颇有离经叛道之感,“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5]233,以实现对自我的追寻。

(二)反抗文化对自我的统治。

顾城家早年被下放到山东省昌邑市火道村,直至 17 岁时才返回北京城,习惯了在自然中奔跑的顾城一时难以适应北京的社会文化形式,开始以自己的话语对抗社会。“17 岁我回到城里,看到好多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都在说一样的话,你说的不一样,他们就不懂……我不能适应这一切,就跑到楼顶上看书……”[15]。顾城在火道村生活的时候,经常与父亲在猪棚里对诗,然后再将其投入火焰,付之一炬,习惯了如此表达自己的顾城很难再重新融入当时的集体话语,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反抗着社会。顾城主动从事油漆工、翻糖工、搬运工、商店营业员等工作,任由别人叫自己“六傻”,努力地与社会文化融合,但无形中又构成了对峙的紧张情形。顾城一直有着叛逆的思想,他喜欢孙悟空式的英雄人物,因为他摆脱了生死的束缚,“他是一切秩序的破坏者,也是生命意志的实现者”[16],他满足了顾城对英雄人物的想象。

同时,顾城在爱情体验中也隐现了这种反抗文化对自我的统治,顾城与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他对社会认知充满了恐惧,不愿轻易与他人交流,因此一直反抗着社会话语对他的冲击和包围。直至认识谢烨,虽然作为社会具象化呈现的谢烨带给了顾城新的人生认识,但在与谢烨相处的朝夕里,顾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天地,谢烨无形中成了顾城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与谢烨相处的日子里,顾城都十分依赖谢烨,不仅日常起居都由谢烨照顾,甚至将需要与外界交流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谢烨,他始终惧怕与社会互动交流。二人移居国外之后,顾城坚决不学英语,在激流岛上基本不与他人来往,与原住民们只有简单的手势等互动,他拒绝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谢烨不得不学习外语,充当顾城与外界交流的传声筒。

在舒婷等人的回忆中，顾谢二人的婚姻并没有表面那样平静，爱情并非生活的全部，当面临世俗社会的经济压迫时，顾城与谢烨经常因为金钱而发生争执，房屋的贷款让顾城不得不接受各种投稿和讲座，必须在“对付完社会后再对付自然（顾城语）。”文学的意义在此被消解，如他所说，在创作中只注重写的感觉，享受写作时情绪流淌的快感，写完之后发行量如何等等皆与他无关，他一直都是个孤傲的诗人。

反文化的自我还体现在顾城对女儿性的渴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参差，男性刚健女性柔软的传统思想一直根深蒂固，但顾城却一直遗憾自己的男儿性，“他憎恨一切生殖的，社会的产生的事物……所有的生长、发育都使他感到恐惧；他幻想一种永远不实现的生活。一个女孩洁净的日子，这在他诞生时就已经错过了。他一直反抗着他的性别，他的欲望……”[9]59-62。顾城尤为推崇《红楼梦》，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描写女性，扭转了古代和现代社会中残留的“男尊女卑”文化。同时，在顾城的认知里，女儿性并非等同于女性，而是一种天生的纯洁，一种佛性和人性的代表，它不受世俗的污染，是世俗社会缺失的和谐人性，准确地说是当时顾城从社会中未曾感知但又渴望的理想人性。同时，传统文化对他的裹挟也侵袭到了爱情生活中，他与英儿相处之时便将其视为自己灵魂共颤的另一半，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在他那里失效，畅游在自己天地里的顾城固执地建立着自己的女儿国，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当地的毛利人，他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文化对峙着。直到英儿的离开致使他的王国坍塌，无法接受乌托邦幻灭的顾城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对抗破碎的现状。他执着地反抗着社会文化对他思想的侵蚀，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对抗的路径，但是，现实的婚姻以及充满危机的爱情时刻警醒着他，使得他从对文化的迷恋走向反文化的迷思。岛由子也曾分析到：“但是反思、反抒情何等强烈，反思、反抒情，换句话说‘反文化’的后面都藏有作者的自我和主观。”[17]在这样分裂的自我中，顾城呈现出了从“文化的我”向“反文化的我”的流变。

三　异域体验下“自我”的消解

不仅社会与时代的变化会带来个人体验的不同，并随之引申出顾城对自我的多重思考，而且异域的新鲜体验也会带给顾城新的思考空间，在异域体验的影响下，顾城对自我的追寻有了新的思考路径，消解了先前对自我的一些认知。首先，他跳出了孩童时期的“常德不离，复归婴儿”的自然状态，开始出入高校课堂，重新尝试与社会接轨；其次，自我的认知与城市缔结成的文化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尤其是在异域文化的体验中，顾城重新认识了精神故乡北京城，也消解了旧北京城中那个孤独而落寞的自己；最后，对有关生死等哲学层面的认知也打破了先前的自然认知观，走向了“无我”的虚无，最终烛照自己，照亮他人，消解了道教文化认知中的自我。

不论是儿时《昆虫记》的启蒙还是在《今天》期间与朦胧诗人的交往，以及成年后的两段爱情经历都汇聚成了顾城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形成了顾城早期对自我的认知。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顾城，其异域的生存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后期自我观念的另一大主题。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产生的人生体验不仅仅是自然风物、社会风俗等可观可察的生活实际，还有内蕴在思想深处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危机，正如刘复生所言，“对于那些具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诗人来说”，“对他们的部分作品的解读无法绕开或明或暗的中国身份，他们的诗作有时也会直接涉及语言或语言中的身份，及母语或另一种语言中的生存经验。”[18]不仅如此，语言的生存经验带来的还有思想沟通与交流的经验反映。映照在顾城的思想体系中，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隐居或逃避，对于陌生语言的拒斥和反感，遁入一种汇聚不同哲理情思的冥思与自我中。在这一精神向度下，顾城对自我的思索走向了人类灵魂深处，偏向了生与死的思考，最终殉道于此，烛照他人。

首先是异域文化映照下对自我的重新定位，顾城自小到大接触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文化，其知识结构一直是完整且丰富的，因此他能在童年、爱情、异域等不同生活经历的参照下，重新认识自我的同时达成对旧的自我的消解。顾城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时，精神上本能地会以某种方式予以回应，从而在这种冲击与回应的过程中找到参照物，进而确认一种阶段性的自我。在未赴国外以前，顾城就受到西方文明的启迪，《昆虫记》是其启蒙的最佳读物，后来在进入《今天》杂志后，顾城开始系统地阅读西方现代派读物。这些文化读物的积淀会使远赴国外的顾城真切地感受异域文化，发现另一番体味。

这种异域文化体验不同于观念中所获得的，因为它是内置在顾城诗歌的资源和营养之中，而异域的实体感受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异，甚至走向观念文化想象的对立面。在德国、巴黎等地出席活动时，顾城总是会无意识地注意当地的思想文化，以兹辨

别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冲击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化便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且在此之中,重新定位自我的认知。“当个人生活的区域发生转移就意味着个体的文化环境随之改变。个人从这个区域向那个区域的转移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19]当认知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认知的参照物也会随之改变,尤其是中西方关于自然认识的不同,顾城对自然的认识多倾向于老庄观点,而西方是将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多采用科学分析的方法,限定自然界。因此,当二者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产生不同层面的体验时,认知主体会不自觉地受到另一主体的影响,从而寻找新的参照物重新认识事物,在思维转换的过程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而顾城在之后的异域生活中,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也确实对自然和自我产生了新的认识,这种异域体验带来的新认识也让顾城对旧的自我有一定程度的消解。

其次是在追寻精神故土中对自我的审视造成了对先前自我认识的改变。异域生活的生存实感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失落和对精神故土的追寻,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离家万里的异域。加之在激流岛上的生活并不如顾城想象中的乌托邦那样美好,顾城就曾在采访中说道:“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并不是我们度假时看到的自然。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现代文明的情况下,你必须一天到晚和自然作斗争。”[3]107 如此种种,加剧了顾城情感上的失落。诗歌和生命一直是一体的,虽然二者都有自己的活动轨迹,但最终都是交叠在一起的,而在顾城这样真性情的人身上,这一点更是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那么诗人的生存体验和情感方面也会有所不同,作为这种体验与情感载体的诗歌自然便会有所呈示。”[20]因此,这种异域情感呈现在顾城 1991 年开始的回忆性作品《城》组诗中,组诗多以北京地名命名,显示出此时顾城身处国外对其精神故乡北京的再认识。不同的生命体验致使人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点对同一个地方的感悟会有所差异,成年后的顾城由于认知和生命体验的丰富,对北京也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不一样的乡土感。“乡土感源自熟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情感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21]此时的顾城身处国外,无论是其赖以栖身的新西兰还是偶尔到访的其他国家,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在德国街头漫步时,看到与北京相似的建筑群落,眼下的所见所闻便与之前的创作主体《城》产生了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二者之间不免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个体的生命体验被唤醒,由此从生命中吟唱出一些诗歌。

城与人的关系会随着时间地点等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幼时顾城的认知里,北京是一座充满了政治气息的城市,旧有的城墙从内到外被彻底地翻修了一遍,历史留下的余韵被消耗殆尽。特殊时期的口号标语漫天飞,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高压的气氛下,顾城对当时北京城的印象只有一些血腥残暴的画面。而在异域的生活让他对北京城有了新的认知,此时的北京城对顾城而言已不再是一座具象化的城市,而是情绪的一种寄托,是一种抽象的情感,寄寓了对家人、朋友情感思念的一个载体,北京成了一个温暖的回忆。此时的北京城已经成了顾城魂牵梦萦的地方,“在梦里,我常回北京,可与现代无关,是我天经地义要去的地方。”[22]此时顾城对北京城的追忆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追寻故乡,而是对精神故土的再回忆,追寻精神故土的经历必然会带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重新认识,灵魂的何处安放等心灵体验,而“异域作为一个不同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一个与自我相对的他者,这之中必然会反映自我的某些意识。”[23]

最后,是文化危机中自我的消解。在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生死的不同体验与认知,可以说构成了文化危机的核心存在。自古以来,人所面临的思考都是从自身出发而展开,诸如“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目标,或如“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的哲学追问,具体化到个体的认知则多是从生死问题的哲学讨论开始。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更多地强调生对于现实的重要性,至于死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式的“存而不论”。但是西方对于死亡的观念更倾向于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来面对现实人生。因此,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顾城生发出的生与死的思考,更多偏向人类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探求。顾城由于个体的独特生存体验,其诗歌和散文中时常隐现着他对于生命的看法,其中关于生死的认知体现了顾城对自我的现实观感,是那种由生到死的自然生命状态。但是,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如黑格尔所言:“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的话,它是最可

怕的东西，而要保持住死亡了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24]使得顾城的诗歌中多了一些西方式的哲学思辨，对于生死问题的讨论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观的直接感受，而是有了一层浓烈的思想意蕴。如顾城曾在《老人》中写道：“死亡是暖和的”，在他的眼中生存和死亡一样，都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而死亡则是对生命的一种体认，是其诗意美之终结。在经历英儿的背叛，谢烨的拒绝之后，顾城最终也将触角伸向了死亡，“在街上奔跑的落叶，碎裂的大字报，……取代了我心上闪出的雨滴，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25]。但是，在过多的异域体验与文化碰撞后，顾城在观念上更进一步，他认为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人文主义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都是强调实有的，对于未知是有期待的，比如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他们觉得人有理性与万物不同，必有一个原因，因此应当有一个发现彼岸和得救的可能。”[26]而中国的古文化类似于太极或者终极，这样一种则是强调一种虚无的状态，即“云在青天水在瓶”，各有各的归属，最终都倾向于“无”，无为而无所不为，因而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下，顾城用死亡与墓床来承担自己最后的倔强，回归到追寻已久的自然的怀抱，是顾城生命体验中永恒的归宿，“现在/我卸下了一切/卸下了我的世界”（顾城《最后》），最终归于虚无的“我”。关于生与死的问题，顾城认为无论是谁最终也还是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后者。换句话说，从作为一个人的终极意义上来讲，对于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是跨域中西，跨越语言和文化，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也逃不过终极意义的追问。因此，无论是顾城选择对西方实有的期待还是中国对虚无的追逐，生与死不过都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虚无，人犹如此，诗歌更如是。

四　结　语

作为诗人个体的顾城，从童年时期的农村生活感受到青年时期的文化参与活动再到新西兰的异域文化体验，他的诗歌观念的流变无不与他的个体体验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从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到内在精神品性的训练与锻造，在自然之我中寻找到既属于个体童年应有的自然生态又生成自然作为人生底色的自由情态。此后的人生无论是从文化自我的养成还是反文化自我的生成都是自然之我的延续，不同的是，经验的丰富与经历的多样使得在时代与年纪双重作用下的观念呈现出流变的同时拥有了文化与反文化的矛盾体验，催生诗人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大量的诗歌文本，也遮蔽了被文化掩盖之下自我的迷失与找寻，形成矛盾冲突的复合体。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异域文化的语境中被逐步放大，无论是语言的生存实验还是生活的实体体验，都明确地指向精神层面的谈论，在这个过程中，顾城的自我逐渐上升到文化的反思，尤其是对于中西生死哲学的体悟，最终实现自我的消解。当努力呈现顾城“自我”观念流变的历史轨迹之时，不应该忘记的是，作为个体的顾城，他同样是一个浑圆的整体，他的内在的不可分割与矛盾冲突，既是一个个体文化观念与自我体验的独特标识，也是一个文化样本在时代与社会中流动不居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顾　工. 烟囱[M]//顾　工. 顾城诗全编.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7-8.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3] 顾　城. 从自我到自然[M]//顾　城. 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4] 舒　婷. 童话诗人[M]//舒　婷. 一种演奏风格：舒婷自选诗集.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64-165.

[5] 顾　城. 无目的的“我”[M]//顾　城. 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6] [日]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9.

[7] 陈　昶. 背向生活的理想主义者：论顾城与海子[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6)：141-152.

[8] 顾　城. 等待这个声音……[M]//顾　城. 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54.

[9] 顾　城，雷　米. 英儿[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10] 顾　城. 生活[M]//顾　城. 顾城哲思录.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38.

[11] 顾　乡. 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46.

[12] 钟　文. 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M]//北岛. 鱼乐：忆顾城.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55.

[13] 田志凌，汪　乾. 青春诗会：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王燕生访谈[N]. 南方都市报，2008-06-29.

[14] 赵小克，丁绪辉，傅　柱. 面向数字人文的顾城诗歌解读：基于词频分析法[J]. 图书馆杂志，2020(11)：106-119.

[15] 顾　工. 答伊凡、高尔登、闵福德[M]//顾　工. 顾城诗

全编.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920.
[16] 顾 城. 传统[M]//顾 城. 顾城哲思录.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91.
[17] 岛由子. 论顾城的"自我"及其诗歌的语言[J]. 江汉学术,2014,33(2):69-77.
[18] 刘复生. 九十年代诗歌关键词[M]//洪子诚. 在北大课堂读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58.
[19]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0.
[20] 李 怡. 东游的摩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96.
[21] 赵 园. 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22] 顾 城. 城·序言[M]//顾 城. 顾城诗全集.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0:836.
[23] 李 春. 异域体验与文学书写[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24]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 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1.
[25] 顾 城. 最美的永远是明天[M]//顾 城. 顾城散文选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86.
[26] 顾 城. 中西[M]//顾 城. 顾城哲思录.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10-112.

Poetics of Experience: On the Concept of "Ego" in Gu Cheng's Poems

XU Yongning, YAN Guangji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 experience is a unique and unrepeatable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Different experiences will bring different social cognition and life thinking, while the unique growth and experience of Gu Cheng from small to large urges him to pursue himself continuously. He began to think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when he was young, and he longed for a natural life. But the change of grow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atmosphere, let Gu Cheng gradually form cultural self at the same time to a counter-culture self, and resist the social culture ruling his thinking, in the rebellion persistent pursuit of himself. After going abroad, he repositioned himself in the light of diverse cultures, reexamined himself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experienced life and death, pursued the ultimate self, and finally formed the dissolution of sel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Gu Cheng's self-concept is not only a unique cultural sample and symbol in the changing times and society, but also the ultimate exploration of an individual's efforts to find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Cheng Gu; individual experience; self-concept; value of life

(本文编辑:魏玮)